

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

——内部演变与外部接触共现的个案

徐 宇 航

提要 据现有研究,福建闽语并无多功能词“放”,广东闽语“放”的多功能特征表现则非常突出。本文自东向西,以广东东部潮州、中部中山、西部茂名三地闽语为考察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全面描写三地闽语“放”的多功能特征,并对这种多功能特征的形成机制进行考证。研究表明,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的形成既有语义沾染特征,又体现动词向介词演变的多重语法化路径,同时兼具方言、民族语接触的实体借贷、模式借贷发展脉络。对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的功能分布与形成机制的考证,是运用语法化理论及语言接触视角观察方言语法现象的有效个案。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的分布特征与形成机制亦对同处于多语多方言地带的其他多功能词形成模式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广东闽语 多功能词“放” 语法化 语言接触

1. 引言

据已有方言调查报告,福建闽语无多功能词“放”的记录,而广东闽语“放”的多功能用法则表现突出,如曹志耘(2008)提到广东惠来、揭东、饶平闽语“放”具有相当于普通话介词“从”的用法,在例句“从今天起”中引出时间概念。施其生(2000)也指出,汕头话“放”具有相当于普通话“在”的功能,引出处所、时间等成分。“放”的处所介词功能亦见于雷州闽语(张振兴、蔡叶青,1998:246),中山闽语“放”还可用作被动标记(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3543)。上述论著略涉“放”的不同功能,为本文全面考察广东闽语“放”的多功能特征提供了线索。

多功能放置义动词在汉语其他方言、民族语及世界语言中也有诸多记录和研究。这些论著提出放置义动词表示“使某物处于一定位置”,并由此发展出各类介词功能。汉语内部的相关研究如郝红艳(2015)、张惠清(2015)、金小栋和吴福祥(2017)等,世界语言如 Imonda(伊蒙达语)、Yagaria(雅加利亚语)以及中国境内民族语如拉萨藏语、维吾尔语亦有放置义动词用作完结体(completive)的记录(Heine 和 Kuteva,2002:248,中译本 337-338 页)。在本文考察的广东闽语中,“放”为动词,既表示放置,也表示释放、放任,并兼有处所动词及引入处所、时间、依据、工具、受事等成分的介词功能,比一般的放置、释放义动词有更为丰富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分布。本文自东向西,以广东东部潮州、中部中山、西部茂名三地闽语为考察对象,用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全面描写三地闽语“放”的多功能特征,并考证这种多功能特征的形成机制。

^{*} 本文获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项目“汉语方言多功能词研究”(MYRG-GRG2023-00021-FAH)支持,初稿曾于第16届国际闽方言学术研讨会宣读,与会同行和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修订提出精湛意见,特此致谢。论文语料为调查所得,并谢三位主要发音人:陈懿瑞(潮州)、刘振通(中山)、苏李(茂名)。文若疏误,责在作者。

2. 广东闽语“放”的多功能特征

据语言谱系性质及移民史材料,广东闽语由福建闽语自东向西蔓延而成,在闽人的迁徙过程中,广东闽语沾染地缘关系密切的粤、客方言及民族语言,形成了异于福建闽语的音韵、语法特征。“放”的各项功能,正是展现福建闽语与广东闽语差异的重要语法现象。共时广东闽语“放”用作动词表示“释放”,也表示“放置”,并由此发展出引入不同论元的介词功能。“释放”义的“放”一般出现于“(NP₁) + 放 + NP₂ + (VP)”结构,表示施事主语 NP₁ 释放受事宾语 NP₂ (去做某事),施事主语 NP₁ 可不出现。同时,因汉语的话题性特征,结构中受事宾语 NP₂ 可前移,此时如施事主语 NP₁ 不出现,句子则成为受事主语句。“放置”义的“放”一般出现于“(NP₁) + 放 + NP₂ + LP”结构,表示施事主语 NP₁ 放置受事宾语 NP₂ 在某地 LP。该结构中施事主语亦可不出现,受事宾语也可前移为“NP₂ + (NP₁) + 放 + LP”。“放”的动词功能在广东闽语乃至汉语其他方言中皆具较大共性,由动词发展而来的介词功能则在广东各地闽语中存在差异,展现出东部、中部与西部闽语的特征分化。以下以语义格理论为基础(杨成凯,1986;袁毓林,2002),描写潮州、中山、茂名闽语多功能词“放”的功能分布与语义特征。

2.1 潮州闽语的多功能词“放”

潮州市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三角洲地区,东与福建省诏安、平和县交界,西与揭阳市的揭东区接壤,南临南海并通汕头市,北连梅州市丰顺、大埔县。潮州市亦称潮州府,历史上为郡、州、路、府治所,现辖四区一县,市区以闽南方言为主,北部少数地区通行客家话。潮州闽语多功能词“放”读为[pəŋ²²³],做动词表示“释放、放置”,如:

- (1) 释放:误会解释了警察就放伊。误会解释了后,警察就释放了他。
- (2) 放置:床顶放本书。桌上放着一本书。

释放义的“放”更多出现于连动结构“(NP₁) + 放 + NP₂ + VP”,此时“放”在“释放”义基础上发展出了“放任、容让”义,如:

- (3) 做²好放个孖团家己去街路? 怎么可以放/让小孩自己去街上?

例(3)中 NP₂(个孖团)既是“放”的宾语,也是 VP(去街路)的主语,表示未出现的 NP₁ 放任或容许 NP₂ 做某事。此外,潮州闽语“放”还可用作处所动词,后接地点宾语,如:

- (4) 我放我里就好,底²块拢无爱去。我在我家里就好,其他地方都不想去。

除了动词用法,潮州闽语“放”也用作介词,引入与动作发生处所、时间相关的论元,还可用作依据介词,引出行为主体,如:

- (5) 处所:我里只猫热天时掂²覆放涂下块。我家那只猫夏天常常趴在地板上。
- (6) 源点(处所):伊爱放香港来。他要从香港来。
- (7) 终点(处所):灯吊放舍顶。把灯挂到屋顶上。
- (8) 时段:我放日昼食茶,蜀暝解死²,无影响。我在中午喝茶,晚上能睡着,没影响。
- (9) 源点(时间):放春天时开始种,花开来正解雅。从春天开始种,花才能开得美。
- (10) 依据:放我睇,伊做起来好。在我看来,他做得好。

例(5)–(10)展现了潮州闽语“放”用作介词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放”主要引入与动作发生场所相关的处所论元,如例(5)“覆”发生的场所为“涂下”;例(6)“来”的行为从“香港”开始;例(7)“吊”的终点是“舍顶”。同时,“放”所引论元已实现空间向时间的发展,具有表行为进行时段及开始时间的用法,如例(8)(9)。第二,“放”字句多具未然特征,如例(6)(7)。这种未然特征在句子中有表惯常等时体意义,如例(5)副词“掂常常”让句子具惯常体特

征,或置于显性、隐性比较句,如例(8)将“日昼”与“蜀暝”比较,例(9)将“春天时”与未出现的其他季节比较时不明显。潮州闽语“放”字句的未然隐现特征平行于泰如片江淮官话(张亚军 2003)等方言,是介词与“已然/未然”时体特征交织的又一个案。

2.2 中山闽语的多功能词“放”

中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隔珠江与深圳相望,西毗江门,南接珠海,北临广州。中山古称“香山”,今珠海、澳门皆为香山辖区。中山境内方言众多,闽、粤、客家方言皆有分布,本文主要考察位于中山中部沙溪、大涌二镇的隆都闽语,兼及南部三乡闽语。隆都闽语素为学界所关注,早在1955年,丹麦汉学家 Søren Egerod(易家乐)就以隆都方言为题,完成了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隆都闽语的共时音系与历时渊源。本文通过调查发现,中山隆都、三乡闽语皆有多功能词“放”,但功能多寡有别于潮州闽语。隆都闽语“放”用作动词表示“释放”义时读[pɔŋ¹¹],三乡闽语则读[paŋ¹¹],两地闽语都另有表示放置的词“安”。中山闽语“释放”义的“放”同样可出现于连动结构(↑NP₁) + 放 + NP₂ + VP中,并由此演化出“容让”义,如:

(11) 释放: 我放伊行。我放他走。

(12) 容让: 放伊向南, [mo⁵⁵] 别向北。放/让他向南, 别向北。

有别于潮州闽语,中山闽语“放”用作动词时还表示给予,如:

(13) 给予: 伊放三本书过我。他送给我三本书。

中山闽语“放”也可作为引入时间概念的介词,还用作依据介词,如:

(14) 源点(时间): 放明早开始, 爱早眯⁵。从明天开始, 要早睡。

(15) 依据: 放我望, 伊嘅⁵ 依都⁵ 唔错, 就是肥昂⁵ 佢⁵ 困。在我看来, 他长得不错, 就是胖了点。

有别于潮州闽语“释放”义、“放置”义动词和表处所、时间类介词的一致分布,“放”在中山闽语中并不能用作放置义动词与处所动词,也没有处所介词用法。同时,中山闽语“放”有潮州闽语所没有的工具、被动介词用法,还用作与格介词,引出间接宾语,如:

(16) 工具: 放对箸夹配。用双筷子夹菜。

(17) 被动: 我放粒蚊拮一喺。我被蚊子叮了一下。

(18) 与格: 伊送三本书放我。他送给我三本书。

2.3 茂名闽语的多功能词“放”

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毗阳江,西接湛江,南临南海,北连云浮、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梧州市、玉林市。茂名闽语集中分布于南部电白、茂南区,在当地称为“黎话”与“海话”,本文主要考察电白区博贺镇闽语。茂名闽语“放”读[paŋ¹¹],亦具有多功能特征,用作动词时表“释放”,并发展出“容让”义,也表示“放置”(茂名闽语“放置”义动词另有“安”),如:

(19) 释放: 个贼我放去。那个小偷被我放走了。

(20) 容让: 怎舍得放细依困家己在舍? 怎么能放/让小孩单独在家?

(21) 放置: 放本书去床困 [te⁵⁵] 那儿。把这本书放桌上。

同时,茂名闽语“放”亦有处所、时间介词用法,还用作依据、工具介词,如:

(22) 处所: 我放 [ja⁵⁵] 这个酒店住一日。我在这个酒店住一天吧。

(23) 源点(处所): 放门罅望依。从门缝里看人。

(24) 终点(处所): 行放东北去。向东北边走过去。

(25) 时段: 汝放眠早头冲凉解感冒个⁵。你在早上洗澡会感冒的。

(26) 源点(时间): 放明日起, 爱早困。从明天起, 要早睡。

(27) 依据: 放我看, 伊无咩⁵ 错。依我看, 他没什么错的。

(28) 工具: 放笔写字。用笔写字。

茂名闽语“放”还可用在动词后作为结果助词,表示减损、消极结果的完成(张其昀, 2005),该用法只见于茂名闽语,不见于潮州、中山闽语,如:

(29) 结果: 做放个鸡杀了那只鸡/斩放丛树砍掉那棵树/枕放伊扔掉它/领衫烧放个空衣服烧了一个洞

3. 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多功能特征的形成机制

广东闽语自东向西迁徙,同一多功能词理论上应具有相对一致的功能分布。而上述潮州、中山、茂名闽语多功能词“放”的动词与介词用法却颇具差异。其中表“释放、容让”义的动词用法见于三地闽语,属广东闽语共性,其他动词及介词、助词功能则具差异,这些异同见于表1。

表1 广东潮州、中山、茂名闽语“放”的多功能特征

地名	动词					介词								助词
	释放	容让	放置	处所	给予	处所	时段	源点	终点	依据	工具	被动	与格	结果
潮州	√	√	√	√		√	√	√	√	√				
中山	√	√			√			√ 时间		√	√	√	√	
茂名	√	√	√			√	√	√	√	√	√			√

由表1可见,潮州、茂名闽语“放”皆具放置义动词和处所、时间介词用法。中山闽语“放”没有处所介词功能但却具有时间介词用法,其工具、被动、与格介词也异于潮州闽语。茂名闽语“放”同样具有工具介词功能,但不能用作被动介词,且具有独特的结果助词用法。由谱系与移民史可知,潮州、中山、茂名闽语自东而西承袭福建闽语,因而考证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功能的形成机制,应由东部闽语开始,再辐射中、西部闽语。研究广东闽语“放”多功能特征的形成机制,实则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多功能词“放”的动词语义并不单一,动词与介词的关系是由单一语法化链形成还是有多项演变路径;第二,处所动词与处所介词关系密切,处所介词又与时间介词的形成直接相关,然而三地闽语“放”并非都能用作处所动词,但却皆可用作时间介词,时间介词形成的原因为何;第三,三地闽语具有差异的工具、被动等介词功能及结果助词用法的来源与成因何在。

3.1 “放”各动词与介词的关系

潮州、中山、茂名闽语“放”用作动词皆有释放义,放置义则在中山闽语中缺失。“放”由动词义演化而来的其他用法多样,亦存在多个语法化路径可能。“释放”义的“放”多见于先秦文献,如《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说文》亦有“放,逐也”的记录。同时,先秦文献也有“放”表示“依据”的动词用法,如《庄子·天运》:“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放”表示“放置”则多见于中古及其后文献。《广雅·训诂四》“放,置也”。《红楼梦》第四十六回“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此类“放”的用法已与现代汉语相同。由历时文献记录可知,“放”表示“释放”“依据”“放置”,皆可找到例证。

基于历时文献,“放”在广东闽语中表“释放”的用法可追溯至先秦,“容让”义源于(NP₁)+放+NP₂+VP句式中的“释放”义,因此“放”的第一条演变路径为“释放>容让”。三地闽语“放”皆有的依据介词用法,也可系联到先秦文献表依据的动词用法,即“放”的第二条演变路径“依据动词>依据介词”。中古之后出现的放置义动词用法则与今广东闽语处所动词及处所介词功能有直接承袭关系。因此,广东闽语“放”的功能形成至少存在三条语法化路径,

并非单一语法化链使然。

3.2 “放”处所动词及处所、时间介词的形成机制

上文已提出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具有三条语法化演变路径。不同于释放义、依据义的发展共性,“放”由放置义发展而来的各项功能在广东闽语中具有差异。由功能分布可见,“放”先由放置义发展出处所义,再由处所义动词发展为处所、时间介词。放置义动词“放”得以发展出处所义的关键在于它常与“方所介词结构”共现,表示放置某物在某处。与“放”高频共现的“方所介词结构”中的处所介词必然具有处所义,“放”与之长期多次搭配,经语义吸收,也有了处所义特征。简言之,“放”处所义的形成源于“方所介词结构”中处所介词的语义沾染,这一语义发展首先发生于粤东闽语。

以潮州闽语为例,潮州闽语表存在、处所义的动词除了“放”还有“在”与“[na²¹]”,两者都可兼做介词。潮州闽语“放”常与方所介词结构“在/[na²¹]+地点名词”连用。该结构中“放”与表处所义的“在/[na²¹]”位置毗邻。因高频连用,“放”沾染了“在”“[na²¹]”的处所义特征,进而形成处所义用法。共时潮州闽语“放”由语义沾染而形成处所义的语义发展已完成,因此“在”“[na²¹]”“放”独用、“在”“[na²¹]”与“放”连用甚至互换语序,语义皆相同。例如潮州闽语“在那里等着”,有七种表达方式:

- (30) a. 在许块等 b. [na²¹]许块等 c. 放许块等 d. 放在许块等
e. 放[na²¹]许块等 f. [na²¹]放许块等 g. 在放许块等

以上前三例为“在”“[na²¹]”“放”独用句式,三者句中皆用作介词表处所;后四例为“在”“[na²¹]”与“放”连用句式,且语序不同,“放”可置于“在”“[na²¹]”之前,亦可置于其后,语义无别。在广东闽语乃至诸多汉语方言中,“放”本就用作放置义动词,后加方所介词结构具有语义合理性。故上述句式中“放+在/[na²¹]+地点名词”应为初始形式,这个具有语义合理性的高频结构让“放”与位置毗邻的处所介词“在/[na²¹]”频繁连用,使“放”沾染其后“在/[na²¹]”的处所义特征。“放”的处所义形成后,便可与“在”“[na²¹]”一样作为处所动词或处所介词出现于句中,于是才有“放+地点名词”和“在/[na²¹]+放+地点名词”结构。在这类结构中,“放”已然成为处所动词或处所介词,此时放置义动词“放”可与处所义介词“放”连用,如:

- (31) 件衫放放床顶。把那件衣服放在桌上。

例(31)第一个“放”表“放置”,第二个“放”表“处所”,二者并行不悖。可见共时潮州闽语“放”表处所用法已稳固。这种连用语块间的语义沾染属语法化演变中的“语境吸收”模式,汉语其他方言亦有平行例证,如沭阳方言、哈尔滨方言的放置义动词“搁”因常与方所介词结构连用演化为处所动词、介词(郝红艳 2015; 刘宇 2015: 85; 金小栋、吴福祥 2017)。

潮州闽语“放”的处所义稳固后可在句中充当处所动词或处所介词。处所介词又因所引论元与句中谓词的关系而分化出表动作处所始终的源点、终点介词。与其他语言及方言类同(Heine 和 Kuteva 2002; 中译本 278-279 页),潮州闽语用作处所介词的“放”也实现了空间范畴向时间范畴的演变,由处所介词演变为时间介词,实现“放置义动词>处所义动词>处所介词>时间介词”的语法化路径。

同时,由上文描写可知,“放”在潮州闽语中的处所动词与多种处所介词用法,并不完全见于中山、茂名闽语。中山闽语“放”不表放置,也没有处所动词和处所介词用法,却有源点(时间)介词功能。茂名闽语“放”也没有处所动词功能。就语法化步骤而言,时间介词由处所动词经处所介词发展而来,中山闽语“放”没有处所动词、介词用法,却用作时间介词,茂名闽语

不具处所动词功能,这些都是演变连续统上的“断链”现象,不符合语法化一般原则。据此可知,“放”的“放置义动词>处所义动词>处所介词>时间介词”路径,不可能是中山、茂名闽语自身的发展,而是东部闽语西迁的结果。从语言接触角度看,这种用法的模式语(也称源语)为粤东闽语,是实体借贷模式使然(Matras和Sakel 2007; Sakel和Matras 2008; 徐丹 2018)。同时,“放”的功能在西迁过程中与广东中西部更为强势的其他方言、民族语相关介词形成竞争,因此中山、茂名闽语“放”的用法异于粤东闽语。粤东闽语乃至福建闽语西迁入香山、茂名地区的史实亦见于各种文献、碑刻。民国十二年《香山县志续编》卷三就有“邑城高族原籍闽之莆田”“鸭冈蔡族始迁祖万春,由福建漳州府上街巷迁香山淇澳乡”“邱族原籍福建泉州府”等诸多记录。清光绪十三年《电白县志·方言》载“(电白)山中声音近潮嘉”,光绪四十一年《电白县乡土志·氏族》亦有当地“邵氏福建莆田人;黄氏福建闽县人;杨氏绍兴年间自闽迁粤,居潮州……”等记录。民国三十五年《电白新志稿·语言》更是明确指出“(电白)考其民族,源于吴楚,后由福建厦门等地,流入潮汕方面,分布于韩江下流一带,复蔓延至惠来、海丰、陆丰,而播散于高雷琼崖沿海各地”。可见中山、茂名地区自古以来汇集各地闽人,闽语层次丰富,方言系统多元。这种复杂的方言源流为多功能语言形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环境。

3.3 “放”工具、被动、与格介词及给予义动词的形成机制

解决了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处所动词、处所介词、时间介词的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之后,再看中山、茂名闽语工具、被动介词来源。据上文论断,中山、茂名闽语多功能词“放”源于潮州闽语的实体借贷。如此,中山、茂名闽语“放”具有工具、被动介词用法则有悖于连续演变原则,再次出现语法化链不连贯现象。因此,中山、茂名闽语“放”的工具介词、被动介词用法,并非源于潮州闽语,而是多功能词“放”根植于中山、茂名闽语之后,自身创新使然。

先看工具介词的形成。由句式结构与语义特征可见,“放”用作处所(包括处所源点)介词具有发展出工具介词的可能。在句式结构上,“放”用作处所介词与工具介词皆可出现于“(NP₁)+放+NP₂+VP”结构,当NP₂为地点类名词时,“放”做处所介词,当NP₂为器物类名词时,“放”做工具介词。在语义特征上,“放”做处所与工具介词都要求结构中的NP₂为“无生名词”,两者具有共性。经某地做某事,“某地”是“做某事”的条件,具有成为“做某事”工具的可能,此时表地点的NP₂如变成“某物”或被理解为“某物”,“放”则由引入某种处所条件变为引入某种物质工具,实现处所介词向工具介词的转化。正因这种结构与语义的许可性,汉语方言乃至汉藏语系统存在诸多处所、工具介词同形的个案(LaPolla,1995; 金小栋、吴福祥,2019)。故此,“放”工具介词应源于处所介词,即“处所介词>工具介词”语法化路径使然。

“放”由处所介词发展为工具介词亦可解释中山闽语处所介词的缺失状态。中山闽语“放”之所以没有处所介词功能,是因为处所介词已发展为工具介词。如中山闽语也存在“放门罅望依”这样的句式。该句在潮州闽语表示“从门缝看人”,“放”引入处所名词,做源点(处所)介词,而中山闽语则表示“用门缝看人”。“门罅”虽具处所性质,却被视为“望依”的工具。潮州闽语与中山闽语对相同句式的不同解读,恰好展现了处所介词向工具介词的发展脉络,也旁证了中山闽语“放”的工具介词用法为处所介词演变的结果。

同时,类同于其他语言、方言的语法化路径,由处所介词演化而来的工具介词“放”在中山闽语中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被动介词,引入施事对象。这种演化的条件为“(NP₁)+放+NP₂+VP”中VP的宾语前移至主语位置,如中山闽语:

(32) 放布包紧³个佢囡。用布包着孩子。

(33) 个佢囡放布包紧³。孩子用/被布包着。

例(32)“放”引入包孩子的工具“布”,受事宾语“个伢团”置于工具之后,“放”作为工具介词不具争议。例(33)“放”同样引入名词“布”,但此时受事对象“个伢团”前移至主语位置,主语受事特征凸显,“放”之后的名词具有工具、施事者两可的解读。“放”从工具介词重新分析为引入施事对象的被动介词。这种被动概念形成后,“放”所引名词不再限于无生名词,具有强施事特征的有生名词也可进入句式,如:

(34) 件事放依知到。那件事被人知道。

例(34)“放”引入有生名词“依”,受事对象“件事”位于主语位置。有生名词“依”具强施事性,句中“放”引入的是施事者而非工具。此时“放”的被动介词用法正式确立,该句式也成为中山闽语典型的被动句式。

中山闽语“放”由工具介词发展为被动介词的语法化路径,与中山粤语乃至整个粤语系统“俾”的发展路径颇为相似。包括中山地区的各地粤语都有被动用法一致的多功能词“俾”(语料亦写作同音字“彼”)。考察出版于香山地区的早期粤语文献《广东省土话字汇》(Morrison, 1828)和《广东方言读本》(Bridgman, 1841)可见,19世纪粤语“俾”具有工具介词功能:

(35) 你彼耳躲听。你用耳朵听。(Morrison, 1828: 231/EE)

(36) 俾手板就杀人。用手就能杀人。(Bridgman, 1841: 69)

“俾”的工具介词用法在现代粤语中仅可见于“俾心机读书”等少数惯用语。现代粤语“俾”做介词主要引入施事者表被动。据姚玉敏(2010),“俾”的被动介词功能亦从工具介词发展而来,发展条件也是受事者前移导致工具介词重新分析,演变模式同中山闽语。中山地区素以粤语“石岐话”为强势方言,故中山闽语“放”的被动介词功能大概率与粤语影响相关。中山闽语用本方言固有的多功能词“放”与粤语的“俾”建立对应范畴关系,比附粤语实现“工具介词>被动介词”的演变,属于语言接触中的模式借贷方式。之所以认为中山闽语“放”的被动介词功能借自粤语,而非粤语“俾”借自中山闽语,还基于中山闽语“放”给予义动词、与格介词用法与粤语的一致特征。如上文所述,闽语内部“放”一般没有给予义动词用法,也不能做与格标记,而这些用法恰是粤语“俾”的功能。因此,中山闽语“放”除了比附粤语“俾”的被动介词功能,也复制了粤语“俾”给予义动词及与格介词用法。中山闽语“放”源于释放义动词的容让义与借自粤语的与格介词用法在语用中还会发生叠置,从而有(37)与(38)的区别:

(37) 我放阿婆写封信。我让奶奶写封信。

(38) 我写封信放阿婆。我写封信给奶奶。

例(37)“放”表容让,意谓我容许奶奶写信,写信的人是奶奶;例(38)“放”引出间接宾语,意谓信的接受者是奶奶,写信的人是我。这种由线性语序差异形成的语义差别,实为“放”内部演变与外部接触下,多功能特征叠置使然。

关于“放”的工具、被动介词功能,还有三点说明。第一,中山、茂名闽语“放”与粤语“俾”都可用作工具介词,而这种功能不见于潮州闽语,因此中山、茂名闽语“放”由处所介词发展为工具介词在结构、语义允许下,亦存在粤语影响的可能。茂名闽语“放”的工具介词功能还存在借入西迁中山闽语的可能。第二,类同汉语其他方言,粤语“俾”发展为被动介词除了工具介词来源,还有使动句“主语操控性降低”条件下的发展路径(蒋绍愚, 1994、1997、2002; 江蓝生, 2000; 冯春田, 2000; 洪波、赵茗, 2005; 张丽丽, 2006; 姚玉敏, 2010)。由于中山乃至其他闽语“放”都没有由“释放/容让”义发展出使动用法,故中山闽语“放”的被动功能并无这种发展路径。第三,有学者通过音韵角度论证中山隆都闽语具有显著闽东北片方言层次(易家乐, 1955/2016; Bodman, 1982; 秋谷裕幸, 2022),而闽东北片闽语有读为[puŋ⁴²](柘荣)、[pɔŋ⁴⁴]

(宁德) ,语源为“分”和“帮”的多功能词(吴瑞文 2015) 。基于音韵特征与功能分布的差异,我们认为中山闽语读[pɔŋ¹¹]/[paŋ¹¹]的多功能词语源应是“放”,与闽东闽语的“分”或“帮”无直接承袭关系。从音韵上看,平声字“分”“帮”在中山隆都闽语读高升调,而[pɔŋ¹¹]读低平调,属阴去调。同时,中山闽语有三套鼻音、塞音韵尾,文韵字“分”读[pun³⁵],韵尾为[-n]而非[-ŋ]。从功能上看,闽东闽语“分”“帮”的语法化路径为“受益者>受损者>受事者”,异于中山闽语“放”的“处所介词>工具介词>被动介词”路径。同时,中山地区具有显著闽东层次的隆都闽语与闽南方言特征明显的三乡闽语(林伦伦、陈小枫,1996: 186) 都有多功能词“放”,“放”并非隆都闽语独有。因此,即便中山隆都闽语有闽东闽语层次,[pɔŋ¹¹]与[puoŋ⁴²](分)、[pɔŋ⁴⁴](帮) 读音上近似,彼此仍是不同的功能词。

3.4 “放”结果助词的形成机制

多功能词“放”在茂名闽语中还能用作结果助词,表示减损、消极结果的完成。从语义角度看,茂名闽语“放”的结果助词用法,与其表终点(处所) 介词用法密切相关,是终点(处所) 介词语义的进一步引申,实现处所终点向事态终点发展使然。但是,如上文所述,这种发展是茂名闽语的个性,潮州、中山闽语皆无此发展路径。如此,在语义发展可能性之外,应有其他影响茂名闽语“放”结果助词功能产生的因素。茂名古为百越之地,在汉人定居之前,已有不少壮人聚居于此。据《壮族通史》考证,至少在南朝时期,永宁郡(今电白东北区域) 已有壮族先民居住痕迹(张声震,1997: 273) 。清光绪年间《电白县志》也提及茂名电白“唐宋以前,壮瑶杂处,语多难辨”的特征(戴由武、戴汉辉,1994: 336) 。今茂名地区虽已无壮民聚居,但历史上的壮语各类特征仍会以“语言底层”形式对茂名闽语产生影响(欧阳觉亚,1991; 李如龙,2005; 陈忠敏,2007) 。今天包括茂名闽语在内的粤西诸多汉语方言具有边擦音[ɬ]声母,以“那·禄”语素命名的地名,以及“瓜酸酸黄瓜”“鱼炸炸鱼”等先正后偏语序词等,都显示该地区方言与壮语关系密切。故此,茂名闽语“放”的功能发展也有借贷壮语的可能。今仍讲壮语的壮民人口以广西为多(张均如等,1999: 1) ,加之广西与粤西地缘关系密切,广西壮语的相关材料或可为“放”的功能提供参考。考察多地壮语材料发现,各地壮语分布着读为[pan]/[pei]/[po]/[pin]的结果助词,表示动作完成、状态实现、行为结果等,如:

- (39) 用[pei¹]几千元钱。花了几千块钱。(上林壮语; 潘立慧 2016)
- (40) 过两日他们在门口挖[pan²]个洞一。过了两天他们在门口挖成了一个洞。(武鸣壮语; 曹凯 2012: 31)
- (41) 老张杀[pei²]只猪那。老张杀死了那只猪。(左州壮语; 晏姝 2018: 105)
- (42) 菜做[pan²]没? 菜做好了吗?(凤山壮语; Diller 2008: 365)
- (43) 叫些银出来就起[pin³¹]些房子了。喊些银子出来就能修成房子了。(龙州壮语; 李方桂 2005: 45)
- (44) 个门关[po⁴]。门关了。(田阳壮语; 朱婷婷 2015)
- (45) 我拿衣服他烧[pan³³]洞一了。我把他的衣服烧了一个洞。(广南壮语; 曹凯 2012: 31)

例(39) -(45) 按自东向西顺序排列,可见各地壮语广泛存在[pan]/[pei]/[po]/[pin]类形式用作结果助词现象。词音相近,用法相同,说明茂名闽语“放”的结果助词功能或与曾分布于该地区的壮语相关。那么,茂名闽语读为[paŋ¹¹]的结果助词是否源于壮语的实体借入,实为壮语的[pan],只是语音上刚好与“放”相同? 若此,则茂名闽语结果助词[paŋ¹¹]只能算与“放”音同,并非“放”多功能特征的一种,亦非由终点(处所) 介词发展而来。

考察壮语[pan]类形式的语法功能,我们认为,茂名闽语的结果助词[paŋ¹¹]应非壮语实体借贷的结果,而是在壮语读音相似功能词的影响下,由“放”终点(处所) 介词发展而来,应为模

式借贷方式。这是因为 壮语 [pan] 类形式不仅用作结果助词 , 还有情态动词、系动词、状态 / 程度助词、能性状语助词等多种用法(曹凯 2012: 29-33) , 而这些用法都不见于茂名闽语。同时 , 茂名闽语“放”处所介词、时间介词、工具介词等用法也不见于壮语。若茂名闽语 [paŋ¹¹] 以实体借贷模式借自壮语系统 , 我们无法解释为何茂名闽语单借壮语 [pan] 类形式的结果助词用法而不借用其他用法 , 也无法解释“放”在茂名闽语中的处所、时间介词等用法缘何在壮语中毫无体现。由此 , 我们更倾向于茂名闽语“放”的结果助词用法源于壮语 [pan] 类形式的模式借贷 , 即: 历史上习得闽语的壮人(源语者) 沿用“终点>结果”的普遍语法化策略 , 将壮语 [pan] 类形式的结果助词功能部分带入茂名闽语多功能词“放” , 发展出表示减损、消极结果完成的助词用法。茂名闽语“放”的结果助词功能属于“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吴福祥 2009; Heine 和 Kutena 2005: 81; Winford 2005) , 是模式借贷方式使然。

4. 结论

多功能语言形式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乃至世界语言 , 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正是其中的一个复杂个案。本文全面调查、描写“放”的多功能特征 , 并以语法化理论、语言接触视角考察多功能词“放”各项功能的形成机制。综合上述研究 , 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复杂的功能分布实则源于以下三条语法化路径(中山闽语——茂名闽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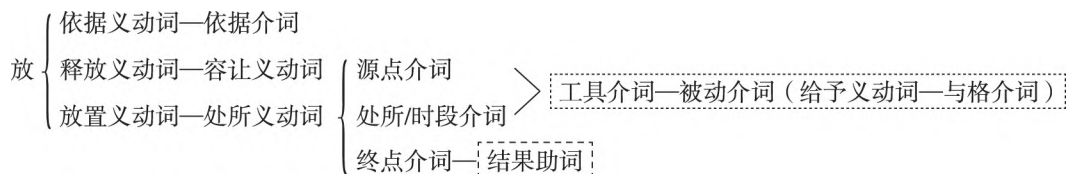


图1 广东闽语多功能词“放”语法化路径

图1可见“放”的多功能特征 , 既有释放义、依据义发展演化的路径 , 又有放置义经语义沾染发展为处所介词的语法化脉络。处所、时间介词随闽语西迁进入语言环境极其复杂的广东中部、西部后 , 当地闽语又与粤语、壮语接触 , 运用实体借贷与模式借贷方式 , 进一步产生了工具、被动介词和结果助词等一系列新功能。“放”在广东闽语的多功能表现 , 正是语言内部结构、语义发展与外部接触、借贷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功能分布及其形成机制 , 对与广东闽语一样处于多语多方言地带的其他方言多功能语言形式 , 具有类型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曹 凯 2012 《壮语方言体标记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 商务印书馆。
- 陈忠敏 2007 《语言的底层理论与底层分析方法》, 《语言科学》第6期。
- 戴由武 戴汉辉(主编) 1994 《电白方言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冯春田 2000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郝红艳 2015 《江苏沐阳方言的“待、搁、蹲”》, 《方言》第2期。
- 洪 波 赵 茗 2005 《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 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 》, 商务印书馆。
- 江蓝生 2000 《近代汉语探源》, 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 1994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绍愚 1997 《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中国语文》第4期。
- 蒋绍愚 2002 《“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 金小栋 吴福祥 2017 《官话方言放置义动词“搁”的语义演变》,《语言科学》第4期。
- 金小栋 吴福祥 2019 《汉语中若干双向性的语义演变路径》,《汉语学报》第4期。
- 李方桂 2005 《武鸣土语》,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 2005 《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民族语文》第5期。
- 厉式金(主修) 1923 《香山县志续编》,《中国史学丛书(初编)011·中山文献7》,台湾学生书局。
- 林伦伦 陈小枫 1996 《广东闽南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 刘宇 2015 《哈尔滨方言语法现象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欧阳觉亚 1991 《运用底层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民族语文》第6期。
- 潘立慧 2016 《上林壮语体标记》,《河池学院学报》第3期。
- 秋谷裕幸 2022 《广东中山市隆都方言的历史音韵特点及其归属》,《声韵论丛》第28辑。
- 施其生 2000 《汕头方言的介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介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 吴福祥 2009 《语法化的新视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吴瑞文 2015 《闽东北片方言两种处置式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吴福祥、汪国胜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七)》,商务印书馆。
- 徐丹 2018 《甘青一带语言借贷的历史层次及模式》,《民族语文》第6期。
- 许宝华 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 晏姝 2018 《崇左左州壮语参考语法》,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杨成凯 1986 《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上、中、下),《国外语言学》第1、2、3期。
- 姚玉敏 2010 《早期粤语中的“界”字句》,《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专著系列第24卷。
- 易家乐 1955/2016 《隆都方言》,康志洪译,陈绍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
- 袁毓林 2002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曾南逸 沈瑞清 林诺舟 2024 《论闽语“厝”本字为“舍”》,《中国语文》第2期。
- 张惠清 2015 《昌黎方言“搁”各功能的语义关联》,李小凡、张敏、郭锐主编《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商务印书馆。
- 张均如 梁敏 欧阳觉亚 郑贻青 李旭练 谢建猷 1999 《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 张丽丽 2006 《汉语使役句表被动的语义发展》,《语言暨语言学》第1期。
- 张其昀 2005 《扬州方言“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得”》,《中国语文》第5期。
- 张声震(主编) 1997 《壮族通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
- 张亚军 2003 《泰如片江淮方言中的“V+L”和“V+在+L”结构》,《语言科学》第4期。
- 张振兴 蔡叶青(编纂) 1998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雷州方言》,江苏教育出版社。
- 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7 《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 朱婷婷 2015 《广西田阳壮语“po⁴(放)”的语法化》,《钦州学院学报》第10期。
- 宗福邦 陈世铄 萧海波(主编) 2003 《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
- Bodman, Nicholas C. 1982 The Namlong dialect, A Northeastern Min outlier in Zhongshan Xian and the influence of Cantonese on its lexicon and phonolog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 (1 & 2): 1-19.
- Bridge, Elijah Coleman 1841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 Diller, Anthony V. N., Jerold A. Edmondson and Yongxian Luo 2008 *The Tai-Kadai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龙海平、谷峰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5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6(4): 1149-1185.
- Matras, Yaron and Janette Sakel 2007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of pattern replication in language convergence. *Studies in Language* 31(4): 829-865.
- Morrison, Robert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Sakel, Janette and Yaron Matras 2008 Modelling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grammar. In Thomas Stolz, Dik Bakker and Rosa Salas Palomo (eds.), *Aspects of Language Contact: New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Findings with Special Focus on Romancisation Processes*, 63-87.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Winford, Donald 2005 Contact-induced changes: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Diachronica* 22(2): 373-427.

徐宇航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xyh2005@gmail.com

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在长春举行

2024年9月21至22日,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在吉林长春成功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语言学会主办、吉林大学文学院承办。

9月21日上午大会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张伯江、吉林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姚毓春教授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致辞。张伯江在致辞中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出发,重温了首任会长吕叔湘先生的殷切嘱托,总结了上届年会至今两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并就新时代我国语言学的任务、机遇和挑战,以及未来的健康发展作了深入思考和展望,热切地鼓舞和激励广大语言工作者勇担责任,为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做出积极贡献。

来自全国53所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的近100位专家学者赴长春出席了本届年会。9月21日上午和9月22日下午举行了两场大会报告,共有10位专家做了学术报告:沈家煊《音法句法如何同构》,邵敬敏《从“干点”到“湿点”说造词“浓缩重组法”》,王云路《论偏义复词的本质特征——兼考“契阔”的词义及其产生理据》,方梅《从北京话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看互动行为对语法的塑造》,曹志耘《方言口传文化及其调查整理》,董志翘《汉译佛典中多音节同义复用形式的来源及最终双音化选择》,储泰松《佛典音译词的改译及其理据》,董秀芳《汉语心理动词中思考义与情感义的共词化》,李子君《金元“〈切韵〉系韵书”纂修体式与传承谱系》,张伯江《从大语法看汉字与汉语相适应》。本届年会分组报告共计6场83篇,与会代表就现代汉语语法与词汇研究、汉语史(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汉语方言与民族语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等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9月22日下午,大会闭幕,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代表下届年会承办单位做在线发言。

年会期间,还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了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并于现场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对“中国语言学会章程”第三条、第十二条做了必要修订,并审议通过15份入会申请。

本届年会的论文将在会后遴选收入《中国语言学报》第二十三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将于2026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会务组)

oriented modality, belonging to the uttering domain; subjective-and-objective-situation causedness corresponds to the epistemic modality, belonging to the knowing domain. Like many other languages in the world, Chinese dialects present an intertwined tense-aspect-modality category. However, Chinese dialects also have certain individualities in that they manifest a broader universal connection between space, time and modality and show differences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at a higher level.

Keywords: causedness/non-causedness; modality; space-time-modality

XU Yuhang, The multifunctional *fang* (放) in Guangdong Min dialects: A case study on the co-existence of internal evolution and external contact

According to current researches, the multifunctional word *fang* (放) which does not exist in Fujian Min dialects is notably prominent in Guangdong Min dialect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fieldwork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fang* in Chaozhou, Zhongshan and Maoming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respectively,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semantic contamination, multiple path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deverbal prepositions, and the language contact with other dialects are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of multifunctional *fang*. This study of *fang* manifest that perspective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anguage contact should be combined in the studies of multifunctional words used in multilingual areas.

Keywords: Guangdong Min dialects; multifunctional word *fang* (放);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DAI Jiawen and SHENG Yimin, The historical source and strata of {TALK} nouns in Wu dialects: A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lexical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strata is a key topic for lexical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Wu dialects, among the thre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TALK} nouns, *hua*₁ (话₁) is found in the earliest stratum, followed by *shuohua* (说话) and *xianhua* (闲话). Besides, in Wuxi dialect, *hua*₁ is undergoing a replacement by *hua*₂. In Fuyang and Changhua dialects, words like *tantou* (滩头) and *tian* (天) are also attested as {TALK} nouns but with a relatively late occurrence. The origins of these nou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nternal innovation and external contact. The former, represented by *xianhua* (闲话), was originated in Suzhou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latter, represented by *shuohua* (说话), was introduced by immigrants from the north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Wu dialects; {TALK} nouns; time of occurrence; source; historical strata; lexical history of Chinese dialects

CHI Mingming, On *ta* (踏)

It'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ta* (踏, "to stamp or tread on") derives from the *fanqie* of MC *ta* (他) and *he* (合). This paper examines various rhyme books and dictionaries of Middle Chinese and proposes that the etymological source of *ta* (踏) is actually *ta* (蹋).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a* (踏) which vary on both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The *ta*₁ meaning *zhuodi* (著地, "to touch the ground") belongs to the *he* (合) rhyme with an initial from the *tou* (透) group; It presents the *fanqie* of MC *ta* (他) and *he* (合). The *ta*₂ is a vernacular variant of *ta* (蹋), which means *jian* (践, "to stamp or tread on"). It belongs to the *he* (盍) rhyme with an initial from the *ding* (定) group and presents the *fanqie* of MC *tu* (徒) and *he* (盍). In moder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a few northern dialects, the pronunciation of *ta* (踏) corresponds to